

禅与西方世界

CHANDESHIJIJIECONGSHU · CHANYUXIFANGSHIJIJIE

〔美〕佛洛姆 等著



9.5

北方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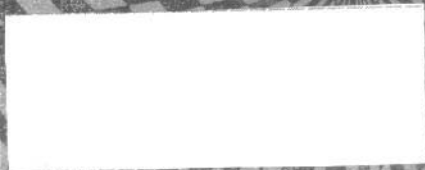


禅与西方世界

〔美〕佛洛姆 等著

徐进夫 译

奋力 编选



禅的世界丛书

奋力 编选

责任编辑： 汤男翔 常勤毅

封面设计： 李欣

禅与西方世界

Chen yu xifang shijie

〔美〕佛洛姆 等著

徐进夫 等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 印张4 2/16 · 插页2 · 字数84,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460

ISBN 7-5317-0104-9/I·105 定价：1.20元

禅与西方世界

一、风靡欧美的禅

兰丝·罗斯

过去若干年来，有一个小小的日本字眼，开始以一种并非不当的嗡嗡之声，在美国的若干似是不太相称的地方：在学院的讲台上、在鸡尾酒会和女士们的午餐会上，以及校园里聚会之处，传播开来。这个小小的字眼就是“禅”（Zen）。禅有时被称为一种宗教信仰，有时被称为非宗教的宗教，有时只被指为一种“生活之道”；它传自古代，出自异邦；它的哲理矛盾而又复杂。正因如此，它在西方突然绽放而且旺盛起来，才是一种不比寻常的现象。

禅所运用的教义——原始佛教原理的理论体系与适应的修正——植根于日本人民生活里的最独特的要素之中。禅的影响，虽然有隐有显，但几乎可从日本文化的每一个层面看出迹象：从庭园设计到建筑之道、从剑道到柔道、从花道到箭道、从诗道到茶道，以及从绘画之道到演剧之道——几乎处处皆有它的影响。若干世纪以来，禅的渗透实在太完全，

太彻底了，而今如果对禅的本身没有相当的认识，要想了解这个小小岛国的矛盾而又悠久的历史文化，几乎是绝不可能的事。

禅于公元前六世纪顷从它的发源地印度出发，于十二、三世纪经由中国和高丽传至日本（虽然佛教的其他宗派早于第六世纪即已传到日本），经过漫长的时空旅行，而于一九〇〇年左右，始达美国的海岸。经过五十年的孵化孕育之后，而说来讽刺的是，自从太平洋战争之后，它竟在美国突然吸住了一批为数日增的热情支持者；而尤为特别的是，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以及心理分析家，亦在其列。

虽然，禅在美国大众的心灵中已与“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广结善缘，但这与它最近的进军西方世界，毕竟没有什么妨碍。修养有素的禅者都是以耐心著称的人们。西海岸所敬爱的一位老师（roshi），甫于一九五八年圆寂的千崎如幻，所喜引用的一句名言是：“要知生徒可有三等；第一等接得学人，第二等维持伽蓝，第三等为饭囊衣架之徒。”

最近，出生于芝加哥，甫受禅家牧师之职，刻正全权主持京都一座禅寺分院（这对一个西方人、尤其是对一个西方女人来说，的确是一项特别的殊荣）的佐佐木·罗丝，对于禅的怪异面，说了一些颇为中肯的话。她在一九五八年接受圣职时所举行的一次访谈中评述说：“在西方世界中，禅似乎正面临一种崇拜的阶段。禅并不是一种崇拜。西方人的麻烦是：一方面，他们想要相信某种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某种简易的东西。禅是一种自我训练与进修的终生课业。”接

着，佐佐木夫人（即佐佐木·罗丝）描述了她在训练期间如何求学的情形：在僧堂之中一次连续学习七天的时间，每夜只睡一个钟头的觉，连续打坐长达十八个小时之久，没有间断。

禅堂的纪律亦然，虽然没有那么严格，但也不是美国的禅人所完全陌生的。纽约第一禅学研究班（New York's First Zen Institute）的成员，一向聚会习禅，迄今已近三十个年头。若干年来，每逢暑假期间，洛杉矶的禅友们都要举行为时一个星期严格的集体打坐训练。最近，一位来自日本著名古刹的禅师主持了一次“接心”（sesshin）——一个表示定期专心打坐参禅的禅语。邀请函上面印了这样一行字：“请自带睡袋与牙刷。一切免费。”在为期一周的斯巴达式的训练课目表上，赫然印着一张速写像：火眼金睛的菩提达摩祖师——相传将大教从印度传到中日世界的禅宗初祖，而下面的一则通告则是：“让我们大家严格遵守接心期绝对‘禁语’的诺言。”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整整为期七天的时间之中保持沉默不语的规则：一个要由龙蛇混杂的禅生集团——社会名流、各级教师、大专学生、技师与艺人、家庭主妇，以及商界人士——共同忠实遵守的规矩。

那么，这些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们，在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哲学信念，以及审美性向之外，如此热切追求的，究系什么呢？而使他们中的某些人更加认真地委身于难忍难行而又难知难解的修炼的，又是什么呢？答案似乎存在于那些使禅成为一种生活之道的根本特性之中，而这些根本特性可以粗略地归纳如下：禅虽然被它的信徒或追求者视为一种

宗教，但它却没有被视为律法的圣典，没有一成不变的教规，没有武断独断的教条，没有赐人恩宠或为人输通、使人终必得救的救主或圣灵，禅之没有其他宗教体系所共有的这一切属性，使得许多现代人对它有了一种洒脱自在的感觉。而尤胜于此的是，禅所标示的实践目标（运用它所特有的方法）——一种高度的自知以及由之而来的心灵清静，已经引起了包括荣格、佛洛姆以及已故的卡伦·霍妮（Karen Horney）在内的西方心理学家的注意。从柯锡勃斯基（Korzybski）到基尔凯郭尔（Kierkegaard）、从萨特（Sartre）到雅斯贝尔斯（Jaspers）、从克罗阿克（Kerouac）到卡夫卡（Kafka）、从海森伯格（Heisenberg）到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等人在内的现代西方神学、哲学，以及文学名家，亦都参加了禅的讨论行列。德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看到有关禅的著述时，坦承发现了他一直自力探发的那些观念。

对于西方人而言，探讨禅的可能意义，最大的障碍在于难以说明“禅究如何发生作用？”禅以其本身的四句陈词特别强调：它的教义在于文字之外，非言诠所及：

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想要认识禅是什么，甚至只求初步的认识，皆非实地学

习不可。西方人之所以陷入了困境，即在于此。佐佐木·罗丝相信，要想深入禅的独特方法，如果没有导师帮助，是不可能办到的。

禅家的师徒，为了达到开悟的境界，以及由此而来的“心灵平衡”，往往运用某些确实的技巧。这里面有名叫“问答”的办法，用以加速通常的思维作用，使其达到猛然突破而入“恍然大悟”的境地。其次是叫做“公案”的法门，是无法单凭理智所能解决的一种语句，对于惯于推理的心灵而言，往往毫无意义可资臆断，可说是一种名符其实的“哑谜”。但它里面所含的震惊种子，亦可震破封闭了意识之门——打开那因为恒常沉浸于连续不断的分别和差异之中、永远陷于二元论的矛盾境域之内、永远以此作彼而不能见到“实相”的意识之门。

参究公案，不但要全力以赴、精勤不懈地求得解决，而且要实实在在地面对它，而不想到关于它的一切——而这便是吃紧之处，同时也是禅所蕴含的许多矛盾之一。关键在于百折不挠地勉力迫使学者超越无始以来的二元的辩证的思想模式。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吾人既不能舍假求真，更不能以论证或逻辑求得心灵的平静或任何究极的“答案”。在无法以“事实”予人以安慰或解脱的事象中，科学是个著例。科学家不但使物质化为分子，将分子化为原子，提出物质的无限可分之说，而且主张，所有一切的生命现象只是能或力的作用而已。但是，他们所得的辉煌发现，纵使累积起来成一大的总和，对于一般的心灵乃至对于恰好非科学的超特心灵而言，仍然几乎完全不可得而理解。那么，在这个被各种

矛盾学说所统治、永远有着全球性的问题和个人烦恼急待解决的世界之中，一个人究该怎样才能得到“休息”呢？尽管他仍在继续不断地努力解决史实上的大觉世尊悉达多·乔答摩（Siddhartha Gautama）在耶纪六世纪之前所曾面对的那个与个体意义有关的根本问题，那个与生死轮回有关的难解哑谜，但环境已经复杂得太多太多了。

你一旦接受了这个与“意义”有关的古老而又根本的问题，你便已踏上了一条走向死巷的道路，而那便是你的所谓“推理”意识所无法为你解决的困境。而禅的公案就在这个当口被作为一种精神上的炸药举示出来。可是啊，公案就是无法“解说”。公案系为给人直接体会而设计出来的法门。它们是实践那个著名的“逆转效力定律”（law of reversed effect）所用的妙方，往往可使一个人在潜在意识深处获得不可思议的效应。

一个供作参究的话头也许只是出自一首日本古诗的几个句子：“吉野樱花年年开，劈开花树花何在？”或者取自另一首日本名诗的最后一行：“而今明白了：生死不相干。”

提出这行诗作为公案的导师也许会问：“你要怎样才能免除生死？什么是你的真性？不对！不对！不要思考它！只是切切实实地观看它。”他也许会提出几个线索或暗示：“禅，据说，有使你直见自性的目的。好吧，你的自性在哪里？你能将它指出来吗？如果你能将它指出来了，那你就可说是免除生死了。好吧，你已变成一具死尸了。你是不是免除生死了呢？现在，你知道你在哪里么？……现在，你的形体已经化成了四大。你现在在哪里？”

四祖道信请求三祖僧灿：“乞与解脱法门。”三祖问：“谁缚汝了？”四祖答道：“无人缚我。”“那么，”三祖反问道，“既然无人缚汝，还求什么解脱？”诸如此类的答话，艾伦·沃茨表示，“似乎在于将注意力拨回那个问题发出时的心灵状态，似乎是说：假如你的感觉使你烦恼的话，那就找出那个受到烦恼的，究竟是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由此可知，此种心理反应在于尝试感觉感觉的那个和知道知道的那个——使主体翻作客体。”但这并不是容易的事。诚然，这真是“犹如骑牛觅牛”或“如眼可见物而不能见它自己一样。”

卡尔·荣格曾经不厌其烦地指出，对于一般西方人而言，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是一种颇难承受的事情。他在为铃木博士的一本书所写的一篇序言里说道：“试问，我们当中有谁会将这样的绝对信赖托付给一位上师和他那种难以理解的作风？以这样的敬意给与一个比较伟大的人物，是只有东方才有的事。”对于一般的西方人而言，纵使对于一个人的老师的观念不致发生心理上的阻力，在禅的严格训练中也会产生出其他的困难。因此，英语国家所产生的禅学“老师”才如凤毛麟角。是以，对于禅的“异端转化历程”作部分或全心奉献的人，大多必须勉力自求其道才行。

以一般无师指导的追求者而言，对于禅的核心究能透入多少，实在说来，是一件难以估计的事情，但不论以哪一种方式追求——不论是在直接指导之下进行还是独自摸索，趣悟的关键总是不出“当下直见”或“直下觑透”数语。开悟本身的条件，而不是“关于”那个条件的说明，对禅至为重要。禅师们对于西方知识分子所珍惜的一切思维、推理，以及语言

描述，都毫不留情地加以排遣。过度倚重脑袋，牺牲整个意识的其他部分，在亚洲的导师们看来，似乎是一种不但可笑而且可惊的事情。某次，某座禅院的方丈，在一位热心学禅的美国人面前摆了两组小小的无腿洋囡囡，其中一对的重心置于底部，另一对的重心置于上部，当他将它们一齐推倒时，重心在底部的那一对立即站立起来，而重心在上部的那一对则一蹶不振。这位方丈对这个总是侧重大脑功能而忽视全体作用的西方人的困境之例，轰然大笑了一阵。

关于此点，以及与禅的训练有关的一般方法，一个服膺禅道的人，也许可在赫立格尔（Eugen Herrigel）所著《箭艺中的禅》（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一书里得到一些极其有益的线索以及一些可能的好处，那本薄薄的小书详细地描述了一个欧洲学徒——一位大专教授兼手枪与步枪射击能手的欧洲学者——在日本尝试学习含有禅味的箭道时，所受到的为期五年的苦闷而又困惑的锻炼。结果发现，精通此种古老而又神圣的玩艺，实在并不只是学得一些新的技法而已。在担任赫立格尔的导师的那位禅师看来，箭艺无异是“箭手与他自己所作的一种意味深长的竞争。”此种竞争与学习以成功的专业作风射中箭靶毫无关涉——那只是被视为“纯粹恶作”的一种微不足道的目标，只有使人走上“陷入自己的成功泥淖”的不幸境地而已。实实在在地，一天又一天地，这位导师一直以很少的语言但毫不转变的注意，将他的重点放在获得一种叫做“毫无目的地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等待”的境况上——并不只是机体上的紧张，而是要有一副既“清明”而又“轻松”的身心。这位门徒并不是为了“失败”而造就——此

系一种竞争观点的自然结果——只是从“成功”的方面予以考察而已。经过了一番漫长的苦斗之后，当这位极其耐心但颇困惑的西方人学会了如何“不射而射”、只是轻松而又自然地“让箭从他身上落下”，就像成熟的水果从果树的上面或如聚集的雪块从压弯的竹竿上面落下一般时，他感到他终于获得了已悟之人的行为的奥妙。

求得禅的生活之道的支持，深入使禅更有韵味的中国道家影响之中，返回距今两千年前佛教在印度所作的开拓之间，也许是一种颇有裨益的做法——甚或是一种极其紧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禅认为它自己比属于佛教两大主流（大乘和小乘）的许多宗派中的任何一派，都更接近伟大教主悉达多·乔答摩所立的原始教义。禅的强调独立自恃，侧重努力“自见自性”，可使我们想到佛陀对他的第一批弟子所作的那种革命性的挑战：“汝若返观，汝即是佛。”——默然否认自身里面的任何特有神性或神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事。

佛教的印度教主，诞生于公元前五百六十年左右，当时的情况与我们今日的情况并无不同之处，那时候，大凡有思想能力的人，都被矛盾冲突、互不相容的哲学扯得四分五裂，对于生命的起源、人生的意义与目标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时，注定必将成佛，必将成为大觉世尊的悉达多·乔答摩，是位于今之尼泊尔境内的一位属于军人阶级的富有国王的儿子兼王位继承人。据说，这位被称为悉达多太子的少年王子，打从出生以后，就受到他那过于宠爱的父王的悉心保护，千方百计地避免让他的爱子看到人生的阴暗面

或悲剧面。但当年轻的悉达多太子到达成年的阶段后，他终于悄悄地到禁城的大门之外做了一连串的秘密游览，而在那些地方看到了三个可悲的景象，因而使他的命运有了彻底的改变，那三个可悲的景象是：一个落魄而又颓伤的乞丐，一具有家人围绕哭泣的尸体，一个举目无亲的残疾之人。

于是，这位太子的本来平静的心灵受到震动了；于是他开始向他自己问了一些严肃的问题。当痛苦与折磨侵袭生命的根本之时，在贫穷与疾病侵犯不止是少数人民的时候——在所有这些都像伴他出游的侍从所说的一样时，人生的意义或价值究竟何在呢？人生既然终究要无可避免地在死魔的神秘杀害中消声匿迹，那么，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旨可言呢？

面对着这些困人的问题，悉达多太子终于再也不能忍受他那似是安全而又豪华的生活，终于留下了美丽的娇妻和初生的爱子而于午夜悄悄逾城出走，展开了为时七年的流浪生活，到处寻师访道，为他那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寻求答案。千辛万苦，经过了好大一番周折，最后，他终于在尼连禅河畔的一株菩提树下深入禅定，而于抬头睹见明星时忽然大悟。如今，在亚洲的雕塑和绘画中时常见到的这尊盘腿而坐、双手交叠膝上、两眼收视返观的坐禅雕像，对于东方人民，正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形象，对于西方世界一样。

悉达多·乔答摩，既经大悟成佛之后，便开始前往印度各地传教布道，仆仆风尘，说法达四十九年之久，没有虚度一点时光。他的目的并非解救他人，而是帮助他人自救自度，自求解脱；这便是禅宗与那个大乘佛教的分歧起点。佛陀所讲的是泯除两边的“中道”之教。此教主要是一种陶冶心

性的宗教，以自主和去执为锻炼身心的目标。它的原理原则具体表现于包括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以及正定在内的“八正道”或“八圣道”之中，一个人只要切实奉行，不但可以消除贪欲、贪恋，以及贪着之苦（因为“贪”为众苦之“因”），且可消除隔绝生命大流的个我之虚妄想象，进而达到完全的自在解脱，而不再有欠缺、被夺，以及死亡等等的怖畏和恐惧。

虽然，佛陀的这种不但直接而又实际、同时清明而又无限容忍的教学，已在它的诞生之地输给了比较贪欲的印度教，但它不仅在亚洲的其余部分一直兴盛了许多世纪，且在其发展的历程中承受了沿途各种文化的色彩，就象长江大河映带了两岸的种种景色一般。因此之故，禅——Zen，或如中国人所称的 ch'an——可以说是此一古老教义的中国的和日本的表现方法，而开出禅的动态观照“自静其心”、完全觉醒、既非被动、又无犯意的特有形态的，则是有着道教背景的中国人。日本这个年轻而又急切的国家，当它接受其时已有高度发展的中国文化之际，同时也获得了中国的佛教——并非出于战争或征服，而是积极主动地、且带着充分的热情传而受之。于是，日本人以其实际的，而本质上却是爱美而又神秘的天性，以种种创始的方式将禅的种种微妙的动力法则用到了他们自己的固有文化上面。

最近，美国对于日本文物所作的反应，尤其是对于矛盾而又微妙的禅所作的反应，不论与美国的占领日本是否有关，都曾发生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虽然，这似乎并不只是因为少数几个美国大兵听到了“禅”这个词儿的关系。但显而

易见的是，许多人曾被一个与他们已知的一切完全不同的环境所影响却是确凿的事实。对他们而言，当初对禅发生兴趣，也许是经由相当间接的刺激。对于许多人而言，价值与优点与西方迥异的古老的中国山水画和日本风景画，也许曾是他们进入禅的世界所经过的一个通道。以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审美态度而言，重点多半落在参差有致而非整齐匀称之上，落在并不只是被当作某种东西加以“填满”的空白，而是被当作某种本来实在的东西的空白之上。此等瞒人眼目的单纯艺术作品，往往只用种种不同的格调和质量予以宣泄，以难以比观的微细层次烘托生命的奥秘及其朴实浑厚的性质：栖息在枝上的鸟儿；被雪压弯的草木；半隐半现，露出雾外的远山；人物总是显得非常渺小，并非作为万物的“主人”而出现，而是作为整体的一个相关部分而呈现。

日本人的茶道经验，亦使敏感的西方人在这矛盾的民族精神中感到了某种真正独特的东西。此种强调沉默美德的茶道，多半在花园里的一座有“空室”（the abode of vacancy）意味的小屋之中举行，三五好友默默交往，观想一或两件纯朴而又美观的东西。传统的日本庭园，如龙安寺的砂石庭园所作的表现，为最著名，可说具体而微地表现了直到某些现代绘画作品出现，始为西方人所习知的抽象构成法则。隐含于茶道之中的永恒之感，亦可在一种叫做“能剧”的典型古剧的演出中感觉出来。对于有心人而言，即使是在比较壮观和通俗的歌舞伎中亦可窥见一些禅的影像。在舞台上，一种超过西方快乐或适意限度的长久沉寂，只要“任其所之”而不耐烦地加以抗拒，最后将可现出一种如雷贯耳的气势；一位